

之人腹内。灌入后压杠子逼供，活活将人灌死。这种刑法，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，到处可见。

活剥人皮。1943年夏，迁（安）遵（化）兴（隆）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挺、区干部依林，被敌抓捕后关在特号监。敌人活剥其皮，将他们致死。

坐老虎凳。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，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，或通上电，强行让人去坐。

梁上悬人。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，  
背炭火炉。在审讯时，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，活活把人烧死。

铁器烙人。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，往往用烧红的烙铁、火钩子烫人肉体，强迫招供。兰旗营临时法庭审讯太唐峪村一个姓梁的哑巴，因其不语，用烧红的烙铁逼供，活活将其肉体烧焦。

此外，敌人在审讯时，拳打脚踢，用木棒打，更是司空见惯之事。那个时候，敌人除枪杀被抓捕的无辜群众数以万计之外，在狱中刑讯逼供致死者也难以数计。

（摘自《河北文史资料》第四十二辑）

## 遵化境内的“无人区”

李永春 陈占山

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，日寇出于对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表示“友好”，把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“特区”，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。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全划为“无住

禁作地带”。日伪抓来大批民工在长城以南5公里处，挖一条横贯东西的“防共沟”。沟宽、深各一丈左右。沟的北沿夹上树栅子——鹿砦。隔一公里修炮楼一个，重要山头、道口都有伪治安军安上据点把守。整个“防共沟”边共筑大碉堡26个，日伪约派了4个团的兵力驻扎。集家并村，制造无人区，可分为三种情况：最惨的是成立“部落”，即“人圈”。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；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村人圈，把老百姓从世代居住的地方一律强行搬出，原住房统统拆掉，群众有家不能归，有地不能种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，赶走居民。这类村有93个。第三种是集家并村。对处于纯山区的32个村，人被撵走，房子被封，以防我军站脚。

据统计，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为288平方公里，占全县总面积的19%，包括6680户，约31000口人，其中落入人圈的共950户，4600口人。

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，日寇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，除了夹击、包剿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，不论沟谷川道，还是崇山峻岭，反复搜索，所过之处，草木过刀，宅舍过火，挖洞、推墙、填死水井，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。日伪军限期强迫群众进人圈，稍一迟缓就见一个杀一个，还把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。全县无人区群众惨遭杀害的1200多人。光马蹄峪、沙坡峪、冷嘴头、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，就有647人被杀。盆楼峪的廖振富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，一家老小抱头痛哭，为求活路，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往南走，他领着仨闺女往北走。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，廖振富爷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。冷嘴头张森、张斌哥儿俩，多年苦熬肚攒盖上了三间房，敌人硬逼他们搬家。故土难离，结果误了期限，鬼子放火

烧了房还不算，哥儿俩也被开枪打死。寨主沟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，舍不得离开抗日的八路军，敌人无数次的“扫荡”，烧房180多间，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，前后烧过19次，他们翻盖了19次。一次赶走牛羊200多头，驴36头。掠夺的财物用170盘驮子，整运了6天。两年光景，遵化县无人区共计有112个村变为废墟。罗泉峪村处在偏僻的深山沟，连鬼子的军用地图上也找不到它。因此，那里21间住房没被发现。后来，有坏人告密，敌快速部队闻讯即大规模搜山，终于被发现。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，终于给烧光了。

日寇划定的“禁作地带”，一律不准种庄稼，每当春夏之交，敌人使出最恶毒的一招——割青。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，竟给连割两三次，嫩的萝卜、蔓菁、南瓜也都给铲掉。秋季地里庄稼成熟了，敌人四处抢粮，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敌手。头道城子的滕保义、方平、方占相等7人，正在抢收玉米，讨伐队围上来，当场枪杀了方平、方占相，抓走的另外5人一直下落不明。

由于“三光”政策的摧残破坏，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。有的没房子，竟跟牲口挤在一块儿。起初，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，老换烧，无法垒了，只好四面通风，夏不挡雨，冬不避寒。一个山洞学往往几家同住。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：“百姓无出路，拆房盖草庐，七家子，八家子，同住一个‘屋’……”，穴居野处持续到日本投降前夕，穿的呢，有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，一家子伸一条破被，轮穿一件老羊皮筒，夏天毛朝外，冬天毛朝里。实在冷得受不了，就钻柴堆取暖，拢火烤，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。吃饭成了大问题。秋天还能煮青玉米、老南瓜充饥，平时只有吃野菜、野果、树叶、树皮、胡绿豆、核桃花。吃饭没碗，用碎石板、菠萝叶、窝瓜

皮对付。做饭没锅，用破锅砸、破洋桶、破铜盔代替。敌人黑夜观火，白日看烟，一缕青烟暴露出去，就可能招致日伪的清剿。老百姓想出办法，就让炊烟通过地窖散开。如果吃着饭突然发生敌情，便把“锅”、“碗”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。最紧急时，群众隐蔽在洞子里，三四天不食不动。冷嘴头的何荣，年岁大，又正闹病，家里人进了口外小水泉人圈，他留在家里，临走时给做了一笼屉树叶倅倅当干粮，等过几天亲人看他，倅倅没顾得吃，何荣早饿死了。

被赶进人圈，如同陷入人间地狱。仅以新立村人圈为例，它包括9个自然村，当时530户，2400口人，1942年秋季就成立了“部落”，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墙，围墙四角和大门口设有岗楼。凡成年的男子统统编为反共自卫团（棍团），昼夜轮流巡查。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、筑碉堡、开矿、挖沟，打死累死没人管。

敌伪对人圈控制极严。每10户为1甲，30户为1保，全圈为1乡。成年男子发给“良民证”，只证明身份，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。汉奸、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，时常通过“检举”，把政治犯、经济犯、思想犯、偷运犯之类罪名，强加在无辜群众头上，杀人简直好比碾个蚂蚁。报国队员王雅如、张文奎，被特务盯上，敌兵包围了他们的家，以“政治犯”论罪，被枪杀。1942年大“扫荡”，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群众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，抓出5名所谓“可疑分子”，当众杀害。汉奸告密说陈敏、段文龙“私通八路”，被绑上扔进火堆。日寇要抓劳工了，以“检举”为名，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，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、金连青等31人，集体押送承德服劳役，一去未归。

兵劫、病疫紧相连，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的灾难更大。无人区的群众连衣食住全没保障，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。污水滥流，粪便遍地，蚊蝇随处孳生，有病无医无药，造成各种

传染病蔓延。1943年夏季，鸡鸣村流行瘟疫，一下病倒百十多人。不几天，死亡50口子。人圈的情况更严重。1943年5月到8月，新立村人圈闹瘟疫、霍乱、痢疾，刘福贵一家4口，没出3天都离开了人世。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去530多人。那时候，家家停尸，户户号哭，十分凄惨。

曹致福、年焕兴领导的遵兴支队，王定国、胡光领导的丰玉遵游击大队，时常战斗在遵化地区，配合八路军十一团、十二团和十三团，密切依靠当地干部群众，在无人区里打出自己的天下。

1943年冬，伪军以三个团的兵力突然袭击，包围了驻马兰关西无人区的蓟遵兴游击队。游击队由县委书记兼政委占中率领，巧妙迂回，乘黑夜突出重围，插入敌后，攻其不备，歼灭马兰峪东门守敌50余人。敌人因此曾一连清剿多次，不料我游击大队早已转移。接着，占中又领导新立村人圈坚持在无人区的党支部书记果海等，奇袭马兰峪府金山炮楼，缴获步枪12支，马克沁重机枪1挺，猛挫守敌气焰。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敢露头讨伐。

游击队与报团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，既打麻雀战，也打地雷战。日伪军最怕“地雷请客”，一请客就使他们中计挨炸。1944年腊月降雪前后，迂回在入圈外的杨志革带领战斗小组，秘密出动，在南大圈敌据点大门附近，埋下地雷。可巧，第二天下了雪，路面丝毫不露痕迹，据点的伪军满以为外出讨伐定保平安了，没想到刚出大门，地雷响了，日本皇亲、特务头子千叶手下的国际警察上士藤景被炸死。原来日本鬼子老欺布说“无人区里消灭了八路”，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他们的谎言。

同时，在长城沿线的侯家寨、刁山、马兰峪、前后杖子、寨主沟等村建立起隐蔽的联络站，作为筹集、保存、供应物资的

基地。光寨主沟就有洞子19个，成批的粮食、鞋袜、军装、子弹保存在里面，从没出过差失。我十四军分区供给处干部纪润身，与沙坡峪党支部负责人纪德存结合，用真假洞子巧妙地掩藏我军360匹布、5000多包桐油、400多斤炸药、20箱手榴弹、3万斤公粮。在极端困难的时期，供给处战士激增，经不起考验，叛变投敌。纪润身立即组织群众把物资转移到其他山洞。日本守备队中队长板下、小队长常昭，带领日寇和治安军，分三路围剿。敌人由叛徒带路，来到沙坡峪山沟里找地洞，挖开一看，全是成捆的秫秸，敌人扑空了。经追问叛徒，又搜查看管这些军需品的纪润身。他在老党员邢德福的帮助下，和十三团侦察员王永一起，隐蔽在长城顶上大箭楼。凭两支步枪、两支手枪、13颗手榴弹，据楼反击搜剿的敌人。子弹打光了，就拆城砖往下砸。在敌人冲锋之前的刹那间，纪润身背着腿部受伤的邢德福，首先由箭楼跳下去，攀援陡壁脱险。然后，他又带伤转移到遵京公路边的张家洼埋设地雷，炸毁了日本4辆军车。在人圈里，敌人还建立了乡、保、甲连坐制度，成立了两个连的棍团，站岗放哨，“监视八路”。实际上人圈里有我们的办事员，有我们报国队组织，敌人的组织被我们利用。一次日本守备队大队长范田，要考验考验新立村人圈的棍团，便把队伍隐蔽在人圈一里以外，命令两个特务化装成八路军，到圈里要军鞋军袜。当时站岗的棍团孙怀璧、王连全，一看来的人贼眉鼠眼，趾高气扬，又没带介绍信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他俩说是带领他们去取鞋袜，走着走着，乘其不备，一棍子打昏了前边的特务，又一棍子打伤了后边的特务。然后大叫：来八路了！来八路了！于是锣声四起，300多名棍团追赶着打伤的特务。同时派谢玉如（棍团小头头）去据点（离据点二里多地）给日本守备队送信。在村边上碰见鬼子范田，“认真”地汇报了情况，范田哈哈大笑，

马上到人圈开大会，表扬棍团做得好。第二天又叫送情报的带回来11条金枪烟，作为嘉奖。倒霉的是两个特务，一个只活了两天，一个病倒三个多月。

刁山村的党员邵山，与报国队员一起破坏交通、割电线、送信、放哨，腿脚不停，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“山神老爷”。前杖子村老党员王如、韩庆余，为我军看管供给处山洞子，誓死不下山。为照顾好被掩护的一位从延安过来的领导干部，韩庆余打发独生儿子偷偷越过壕沟去背粮食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伪军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寨主沟的王洪臣、徐贵才、郑方明、郑启田等4家21口人看管一个隐藏军需品的山洞，1942年10月9日，日本鬼子和伪治安军到村里清剿，站到一个场面上整队训话，场面底下就是王洪臣等4家掩藏军需品的洞子。当时，他们和八路军贾文来、老山钟22口人藏在这个洞里，洞子人多、气眼少，大人勉强可以忍受，孩子就架不住了，王洪臣两岁的小儿子群头，憋得直要哭喊，王洪臣的妻子徐桂英，立时用手捂住孩子的嘴。1943年春秋两季日伪军多次来清剿，王洪臣这四家子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，先后藏进黄芦头沟、扒杈沟的洞里，敌人通过洞门，叽哩咕啦的声音都听得着，恐怕孩子哭叫，徐桂英仍然用手捂住孩子的嘴，等鬼子撤退后，孩子才还过气来。就这样，两岁的小群头，在战乱中，一年竟冒了三个死。

（摘自《河北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）